

# 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取向、文化初识与文化转向\*

孙圣勇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 510635; 武汉大学, 武汉 430072)

**提 要:** 据文字记载,西方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历时已逾两千多年。文章梳理西方古代、现代、当代译者的翻译实践和理论,得出结论:西方古代译语文化取向的意译同化翻译策略一直是主流。西方现代翻译理论以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的交际学翻译理论和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为代表,奈达的动态对等翻译思想的着眼点是消除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以适应译语读者。文章对近二三十年西方从文化角度研究翻译这一热点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西方文化翻译理论研究转向的理论标识是操控学派翻译理论、多元系统论翻译理论、描写学派翻译理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和女性(权)主义翻译理论等,导致风靡西方翻译理论界的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真正原因是翻译学研究与文化学研究同时兴起的合力所致。

**关键词:** 西方翻译; 文化取向; 差异初识; 文化转向

中图分类号: H31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0)04-0135-3

## The Culture Orientation, Culture Acquaintance and Culture Tur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West

Sun Sheng-yong

(Guangdong Technical Colleg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Engineering, Guangzhou 510635, China;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Written records show studies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West have been going on for the past 2000 year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 in the West of the ancient,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translators and on this basis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the domestication strategy of free translation of the orientation of target cultures in the ancient West was always the mainstream. The modern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is represented by Eugene A Nida's 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social semiotic translation theory and the focus of Nida's dynamic equivalence translation ideas is on eliminat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e to adapt the target readers. This paper also makes a survey regarding the hot issu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being carried 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in the West in the recent 20-30 years only to find out the theoretical indications of the culture tur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West are manipulation translation theory, polysystem translation theory, descriptive school's translation theory, deconstructionist translation theory,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and so on and the real reason why the culture tur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West occurred is the result from the joint forces of the simultaneous rise of translatology studies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 Words:** western translation; culture orientation; culture acquaintance; culture turn

通过大规模的翻译和借鉴,各民族使自己扩大精神视野,丰富知识宝库,更新价值观念,增强创造激情,提高文化水平,从而把西方文化铸成一个生机勃勃的实体。西方不仅有丰富的文化翻译实践,而且有丰厚的文化翻

译理论积淀。在西方翻译史上涌现了不少杰出的翻译家。他们在大量翻译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很多闪光的翻译思想,为现、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善治’取向的我国地方政府规模与结构优化研究”(70733003)的阶段

性成果。

## 1 不自觉的译语文化取向

西塞罗等古罗马的翻译理论家注重对原作思想和风格的全面再现,强调艺术性的创造,开创了翻译理论研究的先河,也是在西方译界一直长盛不衰的文艺美学翻译观的源头。西方译论以此为开端,缘由何在?黎士旺认为,“东西方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翻译中强势的西方文化对弱势的东方文化的贬抑、渗透和同化”(黎士旺 2007: 53-54)。郑莉认为,古希腊罗马文化时期的翻译潮推动了西方文化发展,主要由于“处于强势的古希腊文化向处于弱势的罗马文化的输入促使西方古代译学思想萌发,并且深受当时的哲学及美学思想的影响”(郑莉 2009: 242)。笔者以为可以归纳为三个原因:一是文化饥渴。虽然罗马在军事政治上征服了希腊,在文化上却如饥似渴地汲取优越的希腊文学和哲学;拉丁语译者不仅要传播希腊文明的思想哲理,还须效仿学习它的文采风格,舍此便不能丰富贫乏的罗马精神和语言。二是地缘优势。罗马和希腊相邻,语言非常接近,全面忠实的翻译是完全可能的。三是语言共性。希腊文学(荷马史诗、悲喜剧等)、希腊哲学全都语言优美,修辞雄辩之风盛行,西塞罗本人就是集演说家、政治家、哲学家和修辞学家于一身。(谭载喜 1991: 23)

可以进一步追问,这些古代的翻译家为何极力主张“演说员”式的意译,而反对“解释员”式的直译?这恰好与郭沫若“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孔庆华 2001: 50)相吻合。当然,“创造性的工作”是具有客观基础的:罗马在军事上征服希腊之后,意识到自己是胜利者,于是不再把希腊作品视为至高无上的东西,在翻译中亦步亦趋,紧随原文,而把它们当作一种可以由他们“任意宰割的文学战利品”。他们对原作随意加以删改,丝毫不顾及原作的完整性,想通过翻译表现出罗马“知识方面的成就”,在文化精神和语言上最终战胜希腊。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初期,人们对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混在一起甚至等同,导致了翻译中有创作、创作中有翻译。除了这些解释之外,也可作出这样的推理,这些译者翻译的目的并不在于向译语读者介绍异国他乡的文化,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建设和发展译语文化,因此,在翻译时尽量不露出翻译的痕迹,力图使译作融入译语文化,化为译语文化的一部分,这样才能增加译语文化的累积,使译语文化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当时的译家在仔细对比希腊和罗马两种语言文化之后,认识到亦步亦趋、逐词直译并不能反映原作的思想原貌,也就谈不上忠实原作,再者逐词直译难以作为译语读者理解和接受,不能融入译语文化,译作难以有效地发挥其功能,难以起到丰富译语文化的作用。由于当时译家的翻译目的主要是通过翻译优秀的希腊文化来发

展和提升相对贫乏的罗马文化,因此选择灵活的意译方法,也就顺理成章了。

以《圣经》为例,“《圣经》翻译在西方翻译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左苏皖 2008: 38)。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率先用大众化的语言翻译德语《圣经》,使《圣经》为普通老百姓所理解和接受(杨平 2006: 120-122)。他翻译的《圣经》被誉为“第一部民众的《圣经》”(鱼为全 2008: 69)。他在翻译中遵循通俗、明了、能为大众接受的原则,广泛采用德国各地方言之精华,提炼出不少新的德语词汇。这部德语《圣经》不仅对德国人的生活和宗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创造为德国民众所接受的文学语言形式,对现代德语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恩格斯称赞他“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

马丁·路德在翻译理论上发表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其中最重要的是“翻译必须采用人民的语言”,他认为译者不应该成为单词的“奴隶”,他说“真正的翻译是把外国语变成译者的本族语言”。马丁·路德的翻译原则归结起来则是“同化”或者意译。正是这种同化翻译使德国人拥有了自己的《圣经》,并以此为契机逐渐形成统一的德国共同语。显而易见,路德的翻译观带有强烈译语文化取向,路德的翻译策略是让作者向读者靠拢,充分挖掘译语本身的资源,把外语文本转变为译语的财产。

综观西方古代这些译家的翻译实践和理论,可以看出译语文化取向的意译同化翻译策略一直是主流,在把外语化为母语,把外国文化引入本民族并使之成为本民族文化一部分的过程中,译语文化取向的翻译策略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之所以说这些译者表现为一种不自觉的译语文化取向,是因为他们的认识停留在两种语言表达的差异,还没有深入到文化的层面。

## 2 解决差异的文化初识

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对翻译中的文化因素较为关注并发表了不少富有启发的见解。奈达的翻译理论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在早期的描写语言学阶段,奈达试图通过对语言句法、词法和语言翻译问题的描写,阐明语言的结构性质,使人们对外国语言以及翻译的基本问题有所认识。奈达对翻译理论的最大贡献是他运用了交际的方法来处理翻译中的问题(汪淑慧 2009: 134-135)。他注重运用现代语言学作为理论基础来分析和解决具体的翻译问题,使他的翻译理论与传统翻译理论有很大的区别。他认为要描述一种语言被解码、转换并生成另一种语言这一复杂的过程,仅靠比较两种语言的结构是不够的,于是他成功地运用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作为他翻译理论的基础。他的交际理论阶段始于1959年,终于1969年。这10年是奈达翻译理论的确立期,在此期间他

发表了两本重要的翻译著作。一本是他的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 (1964), 还有一本是与塔伯( Charles R. Taber) 合著的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1969)。奈达把通讯论和信息论用于翻译研究, 提出了翻译的交际学理论。他认为翻译就是一种交际, 译文如果不起交际作用, 不能被译文读者看懂, 这种译文就不合格。

从70年代开始, 奈达的翻译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他对自己以前的不少观点进行了补充和修正, 但不是完全放弃交际学翻译理论, 而是进而形成了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从社会符号学角度研究翻译活动无疑是翻译理论研究方法上的重大突破(黄齐东 2006: 49-54), “因为翻译本身是一种由一语符向另一语符转换的过程, 不同的语符系统既相区别又相联系, 从而将源语中独特的语符准确地转换为能为本族文化共同承载的语符系统, 是译学界始终关注的焦点”(张勤 2001: 91)。在这一时期, 奈达更多地关注翻译中的文化因素问题, 开始采用社会语言学和社会符号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翻译。他以翻译即交际为前提, 基于“等效原则”, 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翻译原则, 他认为译文读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原文读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 或者说, 译语读者产生与源语读者基本相同的反应。奈达对翻译的定义即体现了动态对等的翻译思想, 他说, 所谓翻译, 是指从语义到语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信息。奈达的动态对等的翻译思想, “对两千年来西方翻译家相持不下的直译与意译之争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廖玲 2006: 48)。在动态对等的翻译中, 译者着眼于原文的意义和精神, 而不拘泥于原文的语言结构, 即不拘泥于形式对应。译者的翻译目的主要是考虑接受者在自身文化情景里的行为模式, 用在文化上更恰当的目标语成分替换隐晦难懂的源文本成分, 使语言上内隐的源文本信息明晰化。如, 英语谚语 *grow like mushrooms* (如蘑菇般生长) 翻译成汉语可用“如春笋般生长”来表达。动态对等翻译的着眼点是译文的接受效果, 是一种语用对等, 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 要做的动态对等则必然要对译文形式进行一定的处理, 这就要求译者对原语的句法、词汇以及文化等方面进行必要的调整, 以使译文符合译语的表达习惯, 达到最切近的自然表达, 消除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以适应译语读者。

### 3 异彩纷呈的文化转向

近几十年来, 翻译理论研究飞速发展, 翻译研究的途径不断扩展, 各种流派的翻译理论涌现出来, 为翻译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视角, 导致翻译学研究兴起。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 文化学研究也蓬勃兴起。正是翻译学研究和文化学研究的同时兴起, 这两股思潮相辅相成、形成合力, 导致了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西方文化翻译理论研究转向异彩纷呈, 主要理论标识有操控学派翻译理论, 多元系统论翻译理论, 描写学派翻译理论,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 女性(权)主义翻译理论等, 这些学派之所以归在文化转向翻译理论的名下, 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它们都强调文化因素(广义上文化因素包括政治、历史、审美等因素)与翻译的关系或对翻译的影响; 二是它们都强调提高译文(或翻译作品)的文化地位, 或与原文平等, 或比原文更重要; 三是它们都将研究重心由原文转向译文。

在1985年翻译操控学派的著名论文集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问世之前, 翻译界似乎从没有针对翻译操控现象进行过专门的讨论。操控学派翻译理论可以分为内部资源理论和外部资源理论。直译和意译问题、译者风格问题、原语取向和译语取向问题、等值和再创造问题、译文读者的选择和定位问题、译本的批评和接受问题是研究翻译操控现象的内部理论资源, 语言学、文化学和西方文艺理论等”是外部理论资源。侯晶晶认为, 增强操控的积极作用之根本方法是在坚持主旋律的前提下倡导文化及翻译的多样性(侯晶晶 2001: 113-118)。

多元系统翻译理论来源于多元系统理论。多元系统理论是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理论, 但其在中国的接受却是最近几年的事情。谢天振对多元系统理论的基本观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并用丰富的例证证明了多元系统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有效性, 指出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谢天振 2003: 59-66)。

描写学派翻译理论主要源于描写语言学理论。曾利沙从描述性方法论入手, 对语际转换过程中文本的缺省性、增生性与阐释性之间的关系及其文本特征进行了概念化表征, 并就文本缺省的识别性特征及其形态表征与范畴化问题进行了阐释(曾利沙 2004: 77-81)。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源自后殖民主义理论。道格拉斯·罗鲁宾逊(D. Robinson) (1997) 对后殖民主义理论有非常详细的分析和总结, 对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产生、发展也有深入浅出的剖析。简言之, 进入20世纪最后20年, 文化学越来越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 最后发展成“后殖民主义”和“后帝国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以其文化政治批判的策略引导翻译研究从语言的内部层面走向了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语境, 由此给予翻译以深刻而具现实意义的揭示(张柏然 2004: 111-117)。很明显, 后殖民主义关心的是政治、民族、种族、帝国主义等政治色彩非常强烈的问题。将翻译的有关问题置于这一大背景下进行研究, 既符合文化研究的发展趋势, 也符合前殖民地国家, 如印度、巴西等, 意欲寻求并确定自身“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 的强烈愿望(后殖民

主义翻译理论主要是由一批前殖民地国家的学者提出,如印度的尼南贾纳(T. Niranjana)、巴基斯坦的萨义德(E. Said)等。他们既接受过本国教育,也接受过欧美国家的教育(李霞 2003: 67-69)。近年来,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发展迅速,势头强劲,新作不断。就连作为文化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后来的研究也有了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倾向,这可从她的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Bassnett, 1999) 一书得到印证。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印度女学者尼南贾纳(T. Niranjana)。尼南贾纳(1992)以印度被殖民的经历、印度在后殖民主义阶段在文化身份、民族性、本土性等方面的困惑和挣扎为主要研究对象,观点最为激进,政治色彩也最强烈。她几乎批评了所有以前的翻译理论和民族学理论,认为它们最大的问题是对翻译和权力与殖民统治的关系认识不够。后殖民主义翻译不仅抛弃了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也批评了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它把翻译完全看作一项国际性的政治活动,它与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民族主义复兴,国际反帝、反殖、反霸的整个氛围是一致的。

女权主义翻译理论产生于女权主义。该理论主张对有悖于女权主义宗旨的原作,在翻译处理中通过措词选择做不同程度的修正,而激进派则力主“重写”,主张“同性作品由同性翻译”。在翻译实践中,女权主义的创造性叛逆通过补偿、前言或脚注、挪用三种途径得以完成。

#### 参考文献

- 侯晶晶. 论文化对翻译的操控现象 [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1).
- 黄汉平. 德里达的解构翻译理论初探 [J]. 学术研究, 2004(6).
- 黄齐东. 社会符号学对奈达“功能对等”理论的阐释 [J]. 江苏外语教学研究, 2006(1).
- 孔庆华. 从文学创作与翻译的过程谈二者之间的关系 [J].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 2001(4).
- 李霞. 权力话语、意识形态与翻译 [J].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3(2).
- 黎土旺. 文化取向与翻译策略——《浮生六记》两个英译

- 本之比较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7(7).
- 廖玲. 从动态对等到新著《语言迷》——浅评尤金·奈达翻译理论转变及其指导作用 [J]. 语言与翻译, 2006(4).
- 刘禾. 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 彭桂芝. 德里达“延异”解构主义翻译观及其理论启示 [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6).
-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 汪淑慧. 交际视角下的奈达翻译理论 [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09(5).
- 谢天振. 多元系统理论: 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 [J]. 外国语, 2003(04).
- 杨平. 马丁·路德的《圣经》翻译及其影响 [J]. 湖北社会科学, 2006(4).
- 鱼为全. 马丁·路德的矛盾思想在翻译上的体现 [J]. 鸡西大学学报, 2008(5).
- 张柏然 秦文华. 后殖民之后: 翻译研究再思——后殖民主义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04(1).
- 张勤. 试析社会符号学的意义观在翻译理论中的作用 [J]. 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5).
- 郑莉.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西方译论及其美学之源 [J].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学报, 2009(3).
- 曾利沙. 论文本的缺省性、增生性与阐释性——兼论描写翻译学理论研究方法论 [J]. 外语学刊, 2004(5).
- 朱晓晖. “异化”——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研究 [J].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3).
- 左苏皖. 西方翻译史之《圣经》的翻译 [J]. 文教资料, 2008(34).
- Eugene Nida. *Towards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 [M]. Leiden: E. J. Brill, 1964.
- Eugene Nida & Charles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M]. Leiden: E. J. Brill, 1969.

收稿日期: 2010-02-10

【责任编辑: 郑丹】